

试论中国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文学社团中的政治文化因素

تحليل عنصر الثقافة السياسية في المجموعات الأدبية الصينية خلال
عشرينيات وثلاثينيات القرن الماضي

Dr. Muhammad Ali Elzayat
Associate Professor - Chinese Literature
Faculty of Arts - Suez Canal University

د. محمد على إبراهيم الزيات
أستاذ الأدب الصيني المساعد
كلية الآداب – جامعة قناة السويس

The Relation between Political culture and Modern literature Groups During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 of Last Century

Literature is the science of anthropology, and the language used to describe the writer's personal experiences. The period of time in which a literary work is written determines its nature in terms of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an introduction, conclusion, and four chapters in which we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ese literature to politics, political cultur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literature, literary group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political culture during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views of literary groups and their development were affected by the trends of political culture. The group of literary studies matched its literary creativity with the historical change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at era, and the ideological change that occurred in the literary creativity group was a clear product of the prevailing political culture of that period.

Key words:

Political Culture, Creation Society, Literary Research Association,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Modern Literature Groups

تحليل عنصر الثقافة السياسية في المجموعات الأدبية الصينية خلال عشرينيات وثلاثينيات القرن الماضي

الأدب هو علم الإنسان، وهو اللغة التي يستخدمها الكاتب لوصف تجاربه الشخصية. كما تحدد الفترة الزمنية التي يُكتب فيها العمل الأدبي طبيعته من حيث التنوع والتعقيد. تنقسم هذه الورقة إلى مقدمة وخاتمة وأربعة فصول تناول الباحث فيها علاقة الأدب الصيني بالسياسة، الثقافة السياسية وعلاقتها بالأدب، المجموعات الأدبية وعلاقتها بالثقافة السياسية خلال عشرينيات القرن الماضي وأخبرا الثلاثينيات واتحاد الكتاب اليساريين. وخلصت الدراسة إلى أن وجهات نظر المجموعات الأدبية وتطورها تأثرت باتجاهات الثقافة السياسية لاتساق صلتها بتطور الثقافة السياسية في المجتمع. فمجموعة الدراسات الأدبية وفقت أبداعها الأدبي مع متطلبات الثقافة السياسية لتلك الحقبة، كما أن التعبير الأيديولوجي لمجموعة الأبداع الأدبي هي نتاج واضح للثقافة السياسية السائدة في تلك الفترة. بينما ينعكس تأثير الثقافة السياسية على ثلاثينيات القرن المنصرم في تغييرها شكل المجموعات الأدبية، فأظهرت جميعها خصائص ثقافة سياسية جلية، والتي تعد بحد ذاتها أهم خصائص أدب تلك الفترة.

الكلمات المفتاحية:

الثقافة السياسية، مجموعة الأبداع الأدبي، مجموعة الدراسات الأدبية، اتحاد الكتاب اليساريين، المجموعات الأدبية الصينية الحديثة

试论中国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文学社团中的政治文化因素

从中国文学演化的历史大势来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着纷繁复杂的表现，中国文学创作的主体多半都有政治倾向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并曾对政治活动保持浓厚的热情，为此不妨说“要弄懂中国的政治，就得了解中国的文学”¹。

如何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客观的存在，它深刻地融入到文化之中，不论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政治学，人们在文学与政治这两端做思想的穿梭；在中国，大到政文合一的礼治实体，小到史文合一的士大夫，都把政治与文学合为一体。就不妨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存在。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受制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与氛围，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力量，都对文学产生着影响；就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造成中国文学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这不仅体现在许多文学作品所表露出的在题材上的政治化特征、在题旨上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而且全面体现在整体的文学目的和观念上。当时特殊的时代特点和特殊的历史任务，不利于纯文学的发展。

看任何事物都可以有多种角度，从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从其他角度所看不到的东西。研究二十世纪初文学时，所采取的切入角度和所采用的方法应该是多元的，使用何种角度，关键要看这种角度、这种方法与研究对象的契合度。

20世纪初期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明显表露出在题材上的政治化特征，换一个说法，当时“艺术创作活动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与当前各种革命实际政策的开始结合”²；同时隐含着一种政治权力运作机制，它广泛涉及不同的党派、社群乃至个人的政治意愿，并以此为中介，影响和制约着当时文学的基本走向。就当时文学而言，如果不顾历史的氛围，忽略文学产生的特殊政治背景，仅从纯文学的角度切入，可能难以对当时各种文学现象、作品作出合理的评价。

中国文学与政治之关

中国古代的那种“大文学”的视野不仅把文、史、哲打成了一片，而且把政治融会在了一起。尤其是政治，它或是强力切入、或是自然渗透到文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色彩、一种要素、一种原质。影响中国文学的政治，是有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决定了中国的政治是一种“伦理政治”；换一个说法，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传统文学作为统治阶级进行政治宣传、思想教化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往往带有明显的伦理色彩。

当我们考察文学与政治的历史联系，也有必要对相关的“政治”概念做一个理论说明。古今中外对该概念有所不同，当今较为流行的政治观念就是：“‘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³。而在中国古代，政治一词的涵义要比上述的要复杂得多，广泛得多，它不仅仅象征着“权力”，同时还暗示着“德誉”，它不仅显示着权柄，还显示这掌权者的人格本体力量。

政治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它要求各种事物都围绕着自己这个轴心旋转，它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生活在社会中的艺术家不可能超脱政治，各个政治集团总要求文艺来适应自己的政治需要，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

文学与政治关系链的存在是具体的，它往往通过创作史、作品史、接受史全面表现出政治观点、作品的政治内涵、接受者的政治观念等，而且这些观念内涵与审美情感结合为某种政治情结。

春秋战国时期的散文和诗歌都生动地记录了该时段的社会、政治发展；《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西汉时期，儒家思想一向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提倡“文以载道”⁴、“文以贯道”，都要求艺术服从并服务于现实统治和政治，极为重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

明清之际，随着封建统治危机不断加深，资本主义萌发及市民阶层逐渐兴起，思想界开始出现了要求用近代的启蒙主义思想来限制君权以至取缔君权的民主思想，要求“政教分离”。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在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下，近代文学更呈现出传统的经世致用和西方学习的双重特点，这中间，其表现出的政治与审美交合的状态，虽与传统文学的教化状态有一定的同构性，但已经有了质的差别。

文学与政治**关系在近现代**的超乎寻常的发展是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状况与古典主义的文学状况固然是人们充满了落后感，但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奋进不止的战斗意志和革命意识。在历史上，文学与政治还从来没有像近现代那样联系得如此紧密。一方面是政治革命引发、带动了文学革命；而另一方面则是文学革命辅助、促进了政治革命。在这一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双重热情在革命青年心头燃烧，并传遍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近现代文学与政治的结合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都与三大文学政治运动相联系。第一、戊戌变法。是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思想家第一次真正地把政治改良与文学革命努力地结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旧文学的性质，梁启超有着明确的文学政治观，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说过：“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⁵，将文学运动与广阔的社会、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突出了文学的政治意义，并由此引发了以文学之名行社会、政治改革之实的社会潮流，近代文艺由此打开了新的发展局面。这一时期，文学尤其是政治小说的地位被提到最高。第二、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在资产阶级政治观念主导下，为民主革命服务的文学运动，这期间也包含了无产阶级文学的萌芽。由陈独秀等人反对“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把革新政治与革新文学联结在一起，这一次文学与政治的结合比起近代要更为全面，更为彻底，更为深刻。仅就文学的那些社会内容来看，也都充满了浓郁的政治伦理色彩；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口号明确地标榜“以人的道德为本”，它已不是什么抽象的观念；及至仲密的《平民文学》提倡与“贵族文学”相对的“

平民文学”，这些不同的说法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宣示了“新文学”所包含的政治底蕴，展示了现代人所热衷、所追求的社会理想。第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团结抗战成了国家政治的最高主题。抗战文学、救亡文学也就成了唯一能推行的文学样式。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文艺服从于政治”、“我们的文艺....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又强调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的这些理论成为了新民主主义乃至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重要方针，对于现当代文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同一性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盛行的思想。论及文学的时代特点，人们往往以当时的政治为参照系，并结合政治的特点来寻求答案；论及文学的历史动向，人们也往往把它与政治秩序变化的历史联系起来做相应的考察。因此，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中实际上贯穿着一条政治线索，这是很值得文学研究者注意的。中国的社会团体主要有朋、党、社、会等，其中，朋与党主要属于政治型，它特别指官僚士大夫结成的某种政治团体，而社与会则相对芜杂，它或者是政治型团体，或者属于经济型、教育型、文学艺术型、生活型等等，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行业性、阶层性、时代性，是一种复杂的社会集合体。在政文合一的这些社会团体中，有的偏重于政治，有的则偏重于文学，有的是先文后政，有的则是先政后文，在这些社会团体，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与政治的交相为用，相辅相成，看到文学与政治的双向交流。

政治文化与文学

1956年，美国政治家阿尔蒙德 (Gabriel A. Almond) 在《政治季刊》上发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文中正式提出“政治文化”的概念。在他的观念中，政治文化是属于“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在具体使用这一概念时，不同的学者在理解上多少是有差异的。

“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民族、国家、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和体系，以及人民关于政治现象的态度、习惯、价值观和学说理论的复合体。而狭义主要是指由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层面所组成的观念形态体系。

“政治”是通过政治文化的方式对文学施加影响，即民族、国家、阶级或集团等政治实体所建构的政治规范和权力机制，是通过营造成某种流行的政治态度、政治感情来影响于文学创作的，而文学创作反作用于政治，也主要是通过这些政治文化方面来间接实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文化”是我们所试图找寻的政治与文学之间关系方式的桥梁。

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研究界或是过分强调艺术对于政治的隶属关系，以至于出现以政治情绪化评判取代客观的文学研究的情况；有意无意忽略文学史上客观存在的政治因素对文学的影响，从而也难以对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作出客观的历史评判。这种描述只能是简单地讲文学现象与政治事件、讲文学作品与作家的政治思想、讲文学的内容与政治的历史进程生硬地直接对应或比附。

政治作为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丰富着文学，成为文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抹色彩。文学总是要反映社会生活，“文学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工具”⁶，即使不直接表现政治，也无法完全摆脱政治的影响。政治势力和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往往不是直接作用于文学创作，而是作用于作家的思想观念再体现于作品。

在任何社会，作为政权机构的政治都会要求相应的文化设施与之配合，文学作为文化形态的一种，必然受其制约，“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到艺术，自然就总是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它为了本身的利益而使一切意识形态都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服务”⁷。

事实已经证明，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文学与政治确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治总是会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参与、影响文学活动，而文学理论又总是以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文学的本体或本质的认识和研究也就无不

渗透着政治的影响，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论争可以说是各种文学理论学说产生和发展的思想文化背景，“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⁸。

文学是在不同层面和意义上与政治发生关系，文学研究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厘清两者的关系。第一个是最低层，是具体的政治政策及其落实。文学或者图解政策，或者反对政策，或者保持中立。这类作品也会随着政策的变化和消失而丧失其政治价值，并且艺术上也因为功利目的过于明显而具有审美缺陷。第二个是中间层，即政治制度层面，包括政党制度、议会制度、新闻出版制度等。文学在此间也会受到影响而形成自己的一套制度和规则，尤其是体制内的文学与研究受到的影响更大。第三个是政治文化层面，比较抽象地以政治观念、精神的形式出现，并且已经融合了社会、民族、世界等其他要素。文学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相对独立，文学的政治负担减轻，更加强调文学的个性化、主体性。鲁迅主张的“为人生”看似是捍卫“文学是人学”的宣言，但却与革命文学内在契合，因为当时的政治就是“人的政治”与“非人的政治”的对立。政治文化是对政治政策、政治制度的提升和总结，是政治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必然结果，文学与政治在此得到了相对独立的自由发展空间。第四个是最高层，即政治审美层面。政治政策、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都以高度审美化、形象化的面貌出现政治如盐入水地与文学融为一体，归于无形。⁹

概述，从政治对文学的角度来看，政治作为统治关系是社会最重要、最有影响、最具有覆盖性和渗透性的因素，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发出认同性召唤，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另一方面，文学总要自觉不自觉地对政治的召唤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应答，或者认同，或者抵制，或者逃逸，或者漠视等等。

20年代政治文化场与文学社团

上世纪20年代标识了一种重要的“过渡”，社会的过度性，其表征首先在于民初政局混乱的加重，还在于思想文化领域的价值权威缺失。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革命带来了自身独立价值，国家、社会、个人、审美等新的要素和内容被纳入文学框架之中并成为中心议题；文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学地位获得空前提高，甚至被置于社会的中心，使得文学被要求为改造国民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服务。

二十年代文学界无论提倡自由主义、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都含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其症结在于国民对独立民族国家建构的热望和对民族主义的自觉认可；文坛出现了“革命文学”、“第四阶级文学”、“国民文学”、“农民文学”、“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三民主义文学”等新文学形态；换个说法来说“这个时代的特点，反映在新思潮运动上，就产生了中国民族民主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接近”¹⁰。社会的过渡性有利于思想文化界的反思，其征象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口号被广泛接受了。

五四时期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内容多为共产主义的宣传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要寻觅当时文学是与政治结合还是保持其独立性的分歧的由来，不能不提到李大钊曾写过著名论文《Bolshevism的胜利》中主张的“为社会写实的文学”；又有必要提出胡适认为陈独秀违背《新青年》“不谈政治”的初衷，反对后来的《新青年》的“色彩过于鲜明”。从“不谈政治”到“文学与政治”紧密结合，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由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的文学研究会正式宣告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它的成立，标志着文学革命不在从属于新文化运动，而开始独立出来”¹¹，文研会密切地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进程相伴随，其文学行为与社会政治文化目的的之间的纠缠，就始终存在的。成立当时，周作人执笔的《文学研究会宣言》

¹²宣布其宗旨有三：“一、是联络感情。……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二、是增进知识。……希望渐渐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

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¹³。组织者有非常明确的社会群体结社意识，文学的“中心”、“公共”、“工会”等词，都突出地强调了统一性和一致性，及其规范性的要求。郑振铎看“《文学旬刊》不得不尽力从攻击方面去做，《小说月报》出版太迟缓，不便多发表攻击的文章，而现在迷惑的人太多，又急需这种激励的药品，所以我们都想把《文学旬刊》如此的做去……”¹⁴。

文研会的发起者以非常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积极的变革意识，一开始就已经将文学群体纳入了政治文化的体系，表现出文学社群自身特殊形态的特征，即自觉将社会政治理念与文学革命主张相交织。首先，文研会的12位发起人中大部分成员在此之前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社会革命团体的参与者，甚至不乏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对文学的呼唤，是与其潜在的变革社会的要求相和谐，他们重视的是文学的神圣的社会功能。文研会的组织原则是高度的统一性，而于传统所不同的是更多地融入了现代社会政治集中的需求，他们自觉地将新思潮、新文化、新文学的传播都同样视为严肃工作，这本身恰恰表明一种政治责任感已经成为社群的精神追求。其次，文研会的发起人在组织建设过程中，更是或明了或潜在地保持着文学目的与政治目标的一致性。政治的具体行为方式往往会内化为某种思维方式，文研会的社群意识是把一系列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文化关系通通简化为二元对立的矛盾：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人的文学与非人文学、为人生与娱乐消闲等，在二元对立的选择中建构了自己生存的逻辑基点。其三，它以政治的敏锐性和先锋性意识建设新文学，站在时代前列引导着文学的主流方向。文研会在批判旧文学的同时，也积极着手新文学的建设。他们比较多地关注文学问题的讨论，选题过大而未能深入，但因其顺应了当时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成功地不断制造出了文学的社会热门话题，从而获得了文学的先锋性效应和主流地位。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早在文研会独

特的政治文化实践中就向人们昭示了一条坚实的文学与政治共生的路径。

文学建设在文研会的社群意识中，就是创造社会热点、时尚文化效应，以达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文研会在短短的二、三年里几乎率先提出或涉猎新文学建设中的所有重大问题，其中以沈雁冰、郑振铎(西谛)、周作人三人的文章为最多。他们不断地制造着文学里的社会热门话题，政治的心理机制被文研会自然地化解于文学之中，获得了文学先锋性的效应、中心的主流地位。

实际上由于文研会独特的政治文化实践，这个时间还要提前了许多，并且有一条坚实的文学与政治共生路径:1921年文研会产生伊始，文学创作的背景、前途问题就提到日程上；1922年至1923年文研会发展期，文学与时代、民众的关系成为热点；1924年至1925年，茅盾有了《论无产阶级艺术》、《文学者的新使命》等文章，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的理解已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标志了文研会与时俱进的文学主流地位已经确立。

在政治文化语境充满着整体社会之时，文学家的诉求与政治家需求的一致性，以及表现方式方法和接受及运作途径，都有那个时代社会转型的特征，更有文学群体不同的丰富性。

创造社1921年7月在东京成立，当时留学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四人都是彼此爱好文学，受国内新文学的影响，也想有一个自己的文学杂志，“创造社的人要表现自我，要本着内心的冲动以城市创作；创作了，表现了，不能不要发表的地方，所以在他们的那种迷梦正酣的时候，泰东书局无论怎样苛刻他们，对于他们是有效用的”¹⁵。创造社的“宣言”是郭沫若因朋友问及入社事宜就在《创造》季刊第二期的《编辑余谈》中说：“我们这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¹⁶。但是回国以后，面对社会现实、文坛现状和剧变的政治改革的历史

氛围，这个原本无太多政治意识的群体，运行于其中，也难免要更多地聚合传统与现代、文学与政治交替混杂的文化内涵。

创造社群体先期是以创作者的姿态和传统文人心态，表现出对于结社的兴趣和热情，对文学本身特性的崇尚和主观的尊重，从其言论中随处可拈，郁达夫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不可以规矩来测量的”¹⁷。创造社最初走进文坛曾郑重声明：“我们皆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我们更想以唯美的观点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现代中国的腐败的政治实际，与无聊的政党偏见，是我们所不能亦不屑言的”¹⁸。但创造社在实践的过程中却更多地表现了文学社群的文化丰富性。创造社寻求自己的阵地的过程，却使得这群浪漫的文学青年切实地感受了人生，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的人生世界并从而关注大众的需求和政治的利益。创造社一开始就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由内之外的政治文化取向，从无意结社到党同伐异的路径。面对文坛竞争和生存抗争，他们在行为方式上较多地因袭了传统的文人相轻、意气用事的行帮习气。

创造社是最不在乎别人对他们说什么，他们强调文学自我的直觉，如同他们自觉的敏感政治一样，这更典型地展示了二十年代文学社群与政治文化整合的另一种类型。因为创造社一切思想态度都是首先从自我出发的，所以在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上显出不同于其他文学团体的整合特征。其一，创造社虽是二十年代文学社群中最不讲结社或者运作的方式方法的，然而却在文坛上掀起了不少的冲击波，其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别开生面而吸引了许多时代青年。其二，二十年代创造社是最不屑谈政治的文学社群，却处处开新文学与政治文化结盟的先河。创造社文学是自我表现的、情绪化的，政治也是非实体性的，新文学的“时代使命”、“阶级斗争”、“艺术与国家”、“革命与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都是最先由创造社提出来的。其三，创造社在二十年代的文坛上并不能算是真正重文学的群体，他们受动于时代广义政治文化语境，创造社的政治是像文学一样浪漫，一样绪化，因此作为文学社群的创造社与作为政治文

化群体的，将留给后人许多有关文学与非文学、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的思考。

虽然现代文学史称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但是后来的成员郑伯奇表示反对说：“创造社的作家，谁都没有这样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郁达夫的小说，成仿吾的批评，以及其他诸人的作品都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和社会的热烈的关心”¹⁹，这就有了关于创造社群体性质的争议，归纳起来看有三类：一是依赖创造社本身成员的自述与表态；一是从既定的文研会视角看创造社；一是就文学团体的文学主张谈文学的创造社。

创造社里最早转向的是郭沫若，1924年翻完《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感悟到在其“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宣布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又“对于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²⁰。他并率先在创造社中倡导“革命文学”，他认为革命文学“是我们现在走在革命途上的文学”²¹，并号召青年：“要把文艺的主潮认定！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²²。成仿吾积极应和郭沫若的革命文学主张，他相继发表《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和《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等文章，承认“文艺是生活基调的反映”²³的原理。由于创造社主要成员文艺思想的率先转变，影响并带动整社文艺思想倾向上出现“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根本性转向。

真正能够体现纲领性主张的是1926年《创造月刊》第三期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这篇论文约7000字，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生史上的经典理论文献之一。在该文中，郭沫若紧扣革命精神勃发的现实场景，要求知识分子理清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时代对他们的要求和他们对时代的要求。他认为：“文学是永远革命的，真正的文学是只有革命文学的一种。所以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革命的前驱，而革命的时期中总会有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出现。”²⁴郭沫若力求明确文学的革命性和时代精神，其目的仍在于实现对青年的无产阶级文学“启蒙”，使他们也拥有“救国救民的自觉”，并反对“旧国家主义”，以求达到全人类物质与精神上的自由解放，实现他所认定的“

新国家主义”，他说：“我们是只有采取新国家主义的一条路，就是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励行国家资本主义。”²⁵

中后期创造社发生了转向，逐渐自觉地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此创造社不断遭受新旧军阀的恐吓和查封。这一过程中，他们创办了很多进步刊物，如《洪水》、《文化批判》、《创造月刊》、《思想》等，并以这些刊物为阵地，提倡和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译介、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和基本原理，这些刊物充分展现了中后期创造社的无产阶级文艺诉求。

1928年1月，创造社新刊物《文化批判》月刊创刊标志着创造社成员实行方向转换，并以崭新的战斗精神开始后期创造社革命文学活动，成仿吾在《祝词》中说“《文化批判》将贡献全部的革命的理论，将给与革命的全战线以朗朗的火光”。

1928年创造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最初发端。很多文章确认是创造社“初步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帜”²⁶，关键在于创造社内部民主主义革命倾向中已经包含着明显的社会主义因素，这能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明确要求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公开发出将“资本主义社会地魔宫屠倒”的号召；第二、不再向西方寻求救国，而转向俄国胜利的十月革命；第三、真诚地与无产阶级认同，并宣称要在文学运动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精神；第四、开始向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中寻求思想指导，对于它的理解还是相当零碎。

创造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阐述、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的大前提下，从三个方面去开拓革命文学疆域：第一、创办文学与社科性刊物，例如《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思想》等；第二、积极译介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第三、阐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提出“全部地批判，开展理论斗争”的斗张。

创造社在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多充满“场效应”的复杂性。第一、创造社的作家将内心冲动的表现欲，生存危艰的精神迫压，转变为群体利益的扩展和从逆反心理而来的再立山头。创造社的

郭、郁、成三位中坚在办“自己的”刊物的过程中，真切地体验到了“自己没有独立的机关，处处都要受人继母式的虐待”。第二、创造社的同人在批评文研会的“垄断”

，攻击文研会的“甚嚣尘上”之时，自己也掉进了“无聊对立”的陷阱。第三、创造社内部也表现出不间断的争斗。其成员无论是元老还是新进都我行我素，不愿受人摆布。同时，又保持对外的不妥协性。

三十年代与左联

所谓

三十年代文学，对现代中国文学史而言具有约定俗成的含义，即从1928年到1937年抗战前期这一阶段的文学。研究该时期文学时，所采取的切入角度和所采用的方法也应该是独特的。如果不顾历史的氛围，忽略文学产生的特殊政治背景，仅从纯文学的角度切入，可能难以对三十年代各种文学现象、作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政权以后，国民政府为了维持和加强自己的思想文化统治，也是为了配合军事上对共产党的围剿，国民党政权在文化领域同样采取了“围剿”政策，努力建立党制文化和党制文学，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对左派文艺工作者进行拘捕、监禁乃至屠杀。国民党直接派军警和特务对进步的文化和文艺界人士进行迫害。暗杀、拘捕、绑架进步文化、文艺界人士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例如，1933年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绑架著名作家丁玲；1935年鲁迅被国民党当局诬为“被日本收买”、“堕落文人”等。

二、捣毁进步文艺团体的机关和书店，查禁进步文艺书籍。1928年国民党政府下令取缔各种进步的小报和小册子；1930年颁布《出版法》；1929年查封了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国民党通过各种渠道，或公开或秘密地对进步书刊进行了查禁，还施行了审查和删改书稿的办法，通过审查官们的不断地禁、删，作品及出版物常常被阉割得面目全非，而且规定：被删去的地方不准留空白。茅盾就曾反复讲起过从事文学创作时，自己时时感到的这种政治压力。当在

《文学》上连载《牯岭之秋》时，原计划写九章，因五至八章关涉“不少当时禁违的东西，很难下笔”，所以将第九章充作第五章结束了这篇小说。在国民党当局施行的书刊检查制度下，许多作品包括不少名著，在出版时往往是残缺不全的。因此，三十年代许多作品发表的往往并非作家真想说的话。

三、提出“三民主义文艺”口号，发起“民族主义文艺运动”。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以后，实行了一整套的文化方略，其中包括实行“党化教育”²⁷。

在国民党加紧文化“围剿”、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的同时，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主民族革命力量也在文化文学战线上开展了积极的“反围剿”和“反侵略”。

在上述因素影响下，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不断深入，许多作家渐渐接受了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当时的上海集中了一大批革命作家，一是由于一部分在“大革命”时期投身于实际斗争的作家，在北伐失败后又回到了文坛上；二是由于蒋介石集团的清党运动和白色恐怖，一部分作家转移到上海租界里；三是受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大批作家加入到革命文学的创作中来。

文化领域内，无产阶级政治思想不断增长；进步书刊增加了流通范围；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翻译和出版出现热潮，1930年以来，左翼作家联盟等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成立，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形成了革命文化的浩大声势。我们可以说三十年代最大的文学群体是以中国左联为中心的。

1930年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共产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对文学实行全面的直接的领导。建党初年随着革命形势的急遽高涨，一部分党人意识到文学对于政治的重要性，他们在领导和参与实际革命工作的同时，即开始热衷于对新文学的引导，努力使其纳入与中国革命的轨道。他们的文学主张是出于一种政治功利观，他们强调文学反映社会人生，偏重于反映革命斗争的现实；他们强调文学的情感因素，偏重于激发民众的精神，是他们从事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

事业；他们强调的是文学宣传鼓动作用，从而要求把文学置于革命的旗帜下，充当革命的工具和斗争的武器，而鄙弃文学的特殊性和作家的独立性。党又通过《宣传工作决议案》指出：“需要党的宣传工作之根本变动而增加对于扩大群众工作的注意”、“宣传之另一种方式就是我党同志参加各种科学及新剧、文学等团体”²⁸、“为适应目前群众对于政治与社会科学的兴趣，党必须有计划的充分利用群众的宣传与刊物，以求公开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党应该参加或帮助建立各种公开的书店，学校，通讯社，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剧团，演说会，辩论会，编译新书刊物等工作。”²⁹

左联成立可以说是下列种种动因的概括。1929年创造、太阳两社遭查封，无论是从党的宣传工作的需要出发，党员们实践其政治理想的革命斗争需要，还是谋求其政治之外的文化层面的抱负，甚至于解决其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重新组织起来、建立新的集体，都是一种最为直接而现实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内在的扩大自身政治主张、革命理想的影响力的政治宣传的需求，由此，成立一个范围更广的文化组织也就是成为党的工作方向。

不妨说，左联的成立乃是倡导和信奉左翼文学观念的知识者对其文化理想的实现的内驱力和共产党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的提议、规划的共同结果，前者是其得以成立的认同性基础和基本动因，后者则为前者的诉求提供了直接的规划与组织。

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左联筹委会所起草的纲领更需报请中央审查，这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占据了筹委会绝大多数，又是因为左联的成立乃是来自中共中央的指示。左联成立后沿着政治性方向发展，首先、从左联筹备小组成员构成来看，除了鲁迅和郑伯奇外都是党员；其次、从主要活动来看，左联时常开会，而开会时往往多是学习和讨论形势³⁰，茅盾说：“左联说它是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政党”³¹，周扬又说：“我们感到当时的左联成了个第二党。为什么叫第二党呢？就是说它实际上跟共产党是一样的。”³²；第三、左联组织的政治化特性带来了左翼文学的政治化特征，而大部分作家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

从左联作家所持的主要文学观念来看，作家的创作事实上仅是左翼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人很容易指出左联文学观众片面夸大了文学的阶级的、政治的属性，夸大了它的政治功能。

无论从哪方面看，左联事实上已不是一个文艺型的团体，而是一个到底的政治文化团体，它通过一系列政治活动和政治性文化批评，来创造出反权力政治的社会力量以及反权力的政治文化。

结语

总括上述，文学史研究的角度应该是多元的，使用何种角度，关键要看这种角度与研究对象的契合度。20世纪各种政治的、文化的需求，尤其是包括战争、国共政治斗争和党内斗争在内的政治原因，使20世纪成为一个非文学的世纪。

政治文化对文学社团动起了重要的制约作用，该阶段作家政治意识普遍增强，这些政治意识左右了社团的文学选择。政治意识、政治价值观的明显的趋导，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从事创作的使命感和源于政治思考的创作预设，而且多少也决定了问题的角度、选取文学题材的眼光和处理题材的方式。

20年代中国文学社团的主张和创作表现，以及不同社团流派的聚合与演变，都或多或少地隐含了文学社群形态的政治文化意向。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的演变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文研会自觉意识到历史的变革，推动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合流；创造社由张扬自我转向鼓吹革命文学；所有这些都无不具有政治文化的潜因，是政治文化的丰富类型决定了不同文学社群各自的特色，又是共同的政治文化环境推动了文学社群的聚合和散落。

政治文化对30年代文学的影响，可以表现出于造成了作家群体的变化，文学群体基本上都呈明显的政治文化形态，或带有明显的政治文化特征，这是30年代文学特色的一个明显的标识。左联在30年代的主要政治策略是，通过一系列政治活动和政治性文化批判，来创造出反权力政治的社会力量，以及反权力的政治文化。

参考书

- [1]朱晓进.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2]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3]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4]陈红旗.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1923-1933[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
- [5]汪纪明.文学与政治之间:文学社团视野中的左联及其成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 [6]蒋明玳.论三十年代左翼青年作家群崛起的社会历史原因[J].扬州师院学报,1992,(1).
- [7]王爱松.政治式写作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J].江苏社会科学,1996,(3).
- [8]孟繁华.左翼文学与当下中国文学[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1).
- [9]陆咏梅.论左翼文学观念[J].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3).
- [10]冒键.20世纪30年代中美左翼文学关系初探[J].燕州大学学报,2006,10(6).
- [11]孙莹.论三民主义文艺政策的提出与退场[J].温州大学学报,2007,20(3).

¹ 林语堂.中国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7.

² 周扬.周扬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75.

³ 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M].北京:三联书店,1999:55.

⁴

文以载道是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观点。“文以载道”的意思是说“文”像车，“道”像车上所载之货物，通过车的运载，可以达到目的地。文学也就是传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

⁵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J].新小说,1902,(1).

⁶

丁丁.文艺与社会改造[A].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53.

⁷

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A].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4:845.

⁸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96.

⁹ 卢衍鹏.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J].社会科学,2011,(7).

¹⁰

周扬.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A].周扬.周扬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357-369.

¹¹ 陈青生,陈永志.创造社记程[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3-4.

¹²

原载《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此宣言还先后刊载于1920年1

2月13日北京《晨报》，1920年12月19日上海《国民日报·觉悟》，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9号。

¹³ 贾植芳等.文学研究会资料[Z].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1.

¹⁴

伍晓辉.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和大众传播的力量[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4

¹⁵ 郭沫若.创造十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68.

¹⁶ 饶鸿兢等.创造社资料[Z].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469.

¹⁷ 饶鸿兢等.创造社资料[Z].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11.

¹⁸ 饶鸿兢等.创造社资料[Z].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487.

¹⁹

郑伯奇.导言[A].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C].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8.

²⁰ 郭沫若.孤鸿[J].创造月刊.第一卷第2期,1926年4月16日。

²¹ 郭沫若.孤鸿[J].创造月刊.第一卷第2期,1926年4月16日。

²²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A].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10.

²³

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A].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16.

²⁴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A].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6.

²⁵

郭沫若.新国家的创造[A].陈红旗.论郭沫若革命文艺思想的现代生成和先锋性[J].广东社会科学,2008,6.

²⁶ 陈青生,陈永志.创造社记程[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²⁷

所谓“党化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将“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政策贯彻到学校教育方面。将“党化教育”办法具体化，甚至要求以国民党训练党员的方法训练学生，以国民党的思想为学生的思想，以“三民主义”为学生的人生观，以国民党的纪律，是学生一切听从国民党的指挥。因“党化教育”引起进步人士的不满，国民党后来又“将“党化教育”更名为“三民主义教育”。

²⁸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四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19页。

²⁹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五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³⁰ 林焕平.从上海到东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活动杂记[J],文学评论,1980,(2).

³¹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56.

³² 周扬.周扬笑谈历史功过[J],新文学史料,1979,(2).

